

学林

← (上接11版)

析,估计杉浦丘园应是一位擅长写真技艺的高明摄影师。

而通过收录在《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回复富冈便笺,能了解直到同年11月8日,内藤还在就富冈所作《刘平国碑考》涉及书法特征问题,提醒后者注意在适当论述中加以补充,互相探讨时间前后持续两个多月之久,且内藤似乎一直在思考跟《刘平国刻石》相关各种问题(参看朱玉麒《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研究》,谨致谢忱)。

总之,如果说法国金石学界是以个体汉学家率先破译《刘平国刻石》并以文本结案成果加以刊布而居优先地位的话;那么,全盘接受中国汉文化染濡的日本学人,是以团体协同攻关形式后来居上,并且研究方案更加精细化,更接近中国传统金石学梳理方法,他们在《刘平国刻石》探索方面所下功夫,堪称跟晚清中国金石学人旗鼓相当,并驾齐驱。只不过日本汉学界获得拓本者相当有限,因而研究人员并不如中国本土学者来得多而逊色不少。

事实上,正当富冈谦三致函杉浦丘园之前的同年早春二月,晚清金石学家杨守敬针对端方藏《刘平国刻石》拓本作跋时,已提及“光绪辛巳(七年,1881),余在日本,潘文勤(潘祖荫)以此《刘平国碑》寄我。以其字泐,解太甚,约略识为治路之记,未尝详考也。”想必杨守敬早年未曾向日本汉学界透露有关西域发现东汉《刘平国刻石》消息。即便同为光绪廿九年张之洞门人、京师大学堂教授王仁俊,在壮游访学东瀛的二月和五月分别题沈塘(沈塘藏本系光绪廿七年[1901]秋季葆恂承让,见上海图书馆沈氏旧藏本间约光绪廿九年沈塘题跋)和端方藏拓本时,日本汉学界也还因大谷探险队尚未海归或收集西域文物尚未运回日本而对《刘平国刻石》浑然不觉。

综上所述,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日本汉学界是通过杨守敬或王仁俊题识才了解《刘平国刻石》的,他们更多可能还是由最初大谷探险队携归西域淘宝所得文物中获得的信息。鉴于该拓本珍贵性与稀缺性,仿佛也促成明治四十二年(宣统元年)和四十四年春大谷探险队第二、三次西域之行时,另两位队员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郎再次直奔现场施行椎拓,共计带回日本约廿份拓本,这是据其日记等记录在案资料盘点的最终数目。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左宗棠的“朋友圈”与西征协饷

徐杨

尽管左宗棠凭借自身的崇高威望以及朝廷的支持,筹得协饷六千多万两,但筹款的艰难程度也反映出协饷制度运转的关键并不在于刚性的制度约束力,而在于疆臣之间的私人情谊。这也加剧了协饷制度的不稳定性。

光绪八年(1883年),刘秉璋迁任浙江巡抚。为筹办海防,刘氏查问库款,发现藩库“空如洗矣”。他探得此种状况为浙江历年供应西北协饷所致,却又不解前任巡抚们,特别是杨昌濬“何以舍己而芸人”。(在清代,朝廷依据各省兵力与财力不均衡的现实,创建了协饷制度。财赋重地如江苏、浙江、山东、山西等为承协省,边远省份如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为受协省,在户部的指令下,承协省的财用转输受协省。这一制度旨在酌盈济虚,在全国范围内对财用进行再分配。)时任布政使德馨告诉刘氏,幕友中风传,虽然杨昌濬竭尽所能协济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但左氏仍时有责言,“问杨中丞之官禄,何自而来”,意即提醒杨昌濬应感念左氏的提携之恩,对于协饷不应“靳而不与”。在刘秉璋看来,左氏之言在私不在公,故而决定“勿解西饷,为海防计”。

不久,时任陕甘总督谭钟麟即致函浙江询问何以停解西饷,刘秉璋以中法战事在即,浙江为筹办海防,“力有不逮”婉复之。由是,陕甘与浙江之间嫌隙渐生。为弥合两位封疆大吏之间的矛盾,左宗棠给谭钟麟写信,告之浙江协济陕甘并非定例,话外之音即此前浙江的协饷源源不断,缘于左氏与浙江官场颇有渊源。事实也确实如此。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左宗棠就任浙江巡抚,并率“楚军”入浙作战,镇压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征战,左宗棠逐次收复浙江全境。征伐与治民之间,浙江有司官员受左氏提携之恩者众多。仅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一次就奏请亲信故交二十余人来浙“分任以事”。左氏所部亲信将领刘典、蒋益沣、杨昌濬皆出任布政使或按察使。故而,左宗棠劝说谭钟麟“毋执成见,过于争竞”。经过左氏一番说和,“其事遂解”。

上述掌故出自刘秉璋之子刘体智所著《异辞录》,虽不全为信史,但也道出了晚清督抚间的私人关系在财政资源调度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求诸史料,同光年间,左宗棠西征

大军的军需供给与左氏本人的交际网络有着高度的关联性。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旨移督陕甘,负责西北军务。彼时,西北局势已呈失控状态,内有捻军和回民叛乱,外有阿古柏势力在沙俄的支持下侵占新疆,图谋陕甘。左宗棠久经沙场,对战局洞若观火,他将筹饷视为西北用兵的头等大事。依清制,遇有征伐,统兵主帅应向朝廷奏请各省协饷,户部确定承协省份以及应协数额之后,再咨文承协与受协省份加以落实。然而,在历经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协饷制度运转的关键从中央下移至直省。若没有各省疆臣的配合,户部的咨文实乃一纸空文。曾国藩给时任山东巡抚阎敬铭的信中曾写道:“弟更事日久,稔知部拨协饷十案九空,故言之多惧耳。”缘此,督抚们私下建立协饷关系并商定数额,再报请户部核准反而更具实效。这一点甚至出现在了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折中。“至江西、湖北、河南等省奉部拨协济甘饷银两,臣道出江西、湖北、河南时,面商各督抚臣,每月实可协银若干,再行奏明办理。其江苏、湖南、四川、山东各省部拨甘饷,俟臣到陕后咨商该省督抚臣,定有确数,再行奏拨。”这种运作模式十分仰赖疆臣们之间的私人关系。私情厚者,不遗余力;私情薄者,“竟如富翁之视穷丐”。

在西北战事的各个阶段,左宗棠分次向清廷奏报西征大军军饷的收支款目。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六年(1866年至1880年),西征大军共收到各省关协饷约6544万两。浙、赣、粤三省所供协饷额位居前三,分别约为1474万两、884万两、816万两。“自古用西北之甲兵者,必济以东南之刍粟。”浙江等东南各省为西征大军源源协济本不足为奇。然而,吊诡的是,财力犹在浙江之上的江苏只为左宗棠所部提供协饷747万余两,约只占浙江的一半,甚至不如江西。此种情势,不得不说是左宗棠与各省疆臣私交好恶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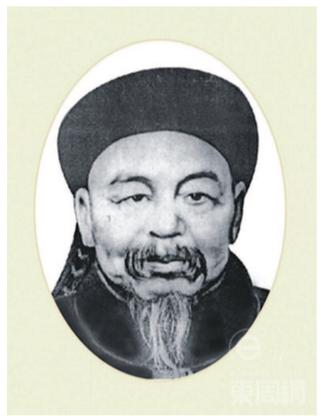
浙江所供协饷在各省中独占鳌头,占到总额的17%,并且浙江是为数不多的按期解款的

省份之一。这还不包括浙海关代还的外债。六次西征借款共筹得1595万两,浙海关代还417万两,占外债总额的26%。薛福成就认为左宗棠经营西北的重要支柱就是浙饷。“浙江一省,亦五者兼备,岁入可得江苏之半,左文襄公用之,以驱殄悍贼,肃清西陲。盖左公后虽去浙,而西政所借,惟浙饷尤丰也。”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浙江取得巨额协饷,与其在主政闽浙两省期间所积累的人脉有着莫大的关系。

左宗棠离浙至西征期间,浙江共历六任巡抚:蒋益沣、马新贻、李瀚章、杨昌濬、梅启照与谭钟麟。左氏离浙后,布政使蒋益沣暂抚巡抚职。左宗棠对蒋益沣有知遇之恩。“益沣年少慧急,曾国藩、胡林翼素不满之,而左宗棠特器重。”在左宗棠入浙“平定”太平军时,他是重要僚属之一。左宗棠赴闽时,称他“于整军、治民各事极意讲求”。而后,左宗棠因与时任广东巡抚郭嵩焘交恶,举荐蒋益沣督办广东军务兼筹军饷,实际上为取代郭嵩焘作准备。左氏在奏折中称赞蒋氏“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不久,蒋益沣果然实授广东巡抚。

马新贻非湘系中人,但他为人谦和,抚浙后,有关善后事宜皆能向左宗棠请益。左氏在给仲兄左宗植的信中写道:“新抚马谷山一遵旧令尹之政,遇事虚怀商榷,稍可慰意。”抚浙期间,马新贻甚至主动提出将每月的西征协饷增加3万两,合共每月白银5万两。而后,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一改前任曾国藩对待西征协饷的敷衍与拖延,积极筹划。左宗棠在给亲信杨昌濬的信中感叹,“曾文正于西饷每多介介”,而马新贻“则不待催请,而自筹济人之度量,相越竟有如此哉”。

杨昌濬早在咸丰十年就已追随左宗棠左右,入幕府,襄办军务。左氏赞他“道义切劘,洁清自矢,堪共患难之人”。杨昌濬抚浙后,对于筹办西征协饷不遗余力,“极为留意”。对于杨氏的尽心尽力,左宗棠不吝溢美之词。他在给部下陈澧的信中写道:“今虽西略方殷,军储



左宗棠

告竭,然使各上座竭其心力所能到者图,石泉(杨昌濬)而外,惟岷庄(刘坤一)惓惓耳。”光绪元年(1875年),杨昌濬因“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去职。左宗棠随即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为杨氏转圜,特别强调了他抚浙七年的功业自在人心。“然观浙民去思之切,亦足见其无负于浙人也。”而后,他又上奏请调杨昌濬前往陕甘襄助,“如杨昌濬能去浙度陇,则臣更可资其臂助,微臣之幸,亦西事之幸”。清廷当时未允。三年后,协助左宗棠的军务帮办刘典因病求去,左氏再次奏请杨昌濬复出,接替刘典主持后方军政事务。这一次举荐得到了清廷的允准,杨昌濬复起,获四品顶戴,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此后仕途畅达,官至陕甘总督。左宗棠自言,称得上“耐久朋”的,只有刘典和杨昌濬。

同样地,谭钟麟也长期与左宗棠共事,并受其提携之恩。同治四年(1865年),谭钟麟由御史出守杭州,随即署任杭嘉湖道。时值左宗棠抚浙,他对谭氏青睐有加,赞其“品正学优、才识卓越”。左宗棠西征时,奏调在籍丁忧的河南按察使谭钟麟使赴陕甘效力。谭钟麟随即出任陕西布政使,负责大军的粮草供需事宜。光绪五年(1879年),谭钟麟由陕西巡抚调任浙江巡抚。谭钟麟既与左宗棠有深厚友谊,又曾督办西征粮台,深知前线饱受缺饷之苦,全力谋划西征协饷自不待言。并且在左氏离开西北时,接任陕甘总督的正是谭钟麟。

(下转13版) ➔